

我印象中的良乡解放

翁向新

进入1948年以后，良乡的街面上越来越紧张，天空中总是笼罩着一层恐怖的乌云。那些土生土长的还乡团，便衣队和巡警，不分昼夜地以“查户口”为名，对“乡亲们”敲榨勒索；成千上万的鱼肉百姓的“丘八大人”们，还在良乡地区演起了“走马灯”：今天开走了“青年军”，明天又进来了“0760”，刚应酬完“红三角”，又得问候“绥靖军”。你看吧，一会儿派款，一会儿要粮，弄得家家鸡飞狗跳墙。

到了秋后就更加混乱了，火车经常停运，店铺连连“歇业”。西门交易场里的枣桑树杈上还挂了好几个“八路密探”的人头。吓得老百姓谁也不敢再赶集上店了。又过了几天，交易市场竟变成了远射程榴弹炮阵地，炮口一会儿朝着坨里乡，一会儿又朝着南梨园村……白天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个匆匆的过客也多是来去慌张、心神不安；晚上，家家都紧闭门户，挤在房舍里判断着枪炮声传来的方向，以便寻找个较为安全的地方让孩子们睡觉。农历11月12日这天夜里，天黑得好像扣了个大铁锅，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在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之后，枪炮声嘎然而止，这更使全城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此时此刻人们的心里可真的没了底——不知熬过这奇怪的令人生疑的“鬼夜”之后，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福呢，还是更大的祸！

第二天，1948年农历11月13日，老天爷出人意外地送来了个大晴天。清晨，东方的鱼肚白好象比往常亮了，太阳也比往常升起得早多了、红多了。当通宵达旦一直处在忐忑不安之中的人们刚刚产生一丝睡意的时候，突然，从大街上传来了分明是青年男子用传声喇叭喊出的清脆声音：

“老一乡一们，父一老一兄一弟一姐一妹一们：你们好！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已经占领了良乡城！从现在起，良乡解放啦！大家不要惊慌……”

人们先是坐在屋子里竖起耳朵听，接着是虚掩着街门从门缝里边窥视边聆听，最后，当看清喊话的是个背着绿挎包、脖子上系着条白毛巾的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时，大家才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慢慢围到他的周围，听他宣讲那一张张用石版印刷的布告。

良乡人第一次发现，他讲的每一份布告上，都不断提到“人民”这两个字。什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呀，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呀，还有“良乡县人民政府”啊，等等，等等。大家边听边小声议论着：

“什么叫‘人民’呀？是不是就是老百姓啊？”

“什么叫‘同志’呀？它跟国民党里讲究的‘同志’是一个意思吗？”

“‘人民’、‘同志’都说的不是‘官面上的人’……”

“共产党、八路军好象把老百姓捧得比官府还高哪！”

“是啊，你瞧他们讲的不尽是些惩处战犯、济世安民的新主意嘛！”……

解放后三天内的事实进一步给良乡的老百姓吃了“定心丸”：开进来的队伍，一点也不骚扰百姓。借东西不但“打条子”，还保准按时还；买东西一定为数给边区票或“大头”（银元），说话办事总是和和气气彬彬有礼……人们明白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真东西，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与“刮民党”、“烙饼队”就是不一样！

几天来，最喜欢实的要数青少年们了：

天一亮就向喊口令、敲锣鼓的地方跑，看那些戴皮帽子的解放军出操，看那些穿灰棉服的“土戏班”扭大秧歌；白天，又东跑西颠地去看新鲜景，打听新闻，然后再互相夸耀着、争辩着交流每人所掌握的情况，晚上，刚撂下饭碗就忙不迭地赶到城隍庙戏台去看《夫妻识字》、《兄妹开荒》、《为谁打天下》、《白毛女》和《赤叶河》等文艺演出。

经过这阵子的“打探”，我们发现：原来这些部队大部分是从东北进关来的老抗日联军；而那些自称是“宣传队”的“土戏班”也并不都是“唱戏的”。他们是“杂牌军”：有的是从西山上下来的“中央团校”或“平西剧社”，有的是“四野”的文工团，有的还是准备去接管北平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大官儿”呢。至于那些住在“县衙门”里的八路军干部，许多人竟是从房山、涑水或门头沟来的当地干部。

经过这几天的跑腾，我们还看到：国民党兵在街头设置的地堡，沙袋清除了，商店开业了，集市恢复

了，连铁路、公路也都通车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乡亲们都觉得，良乡的天突然高了起来，地突然热了起来，路突然宽了起来，人也纷纷乐了起来，连空气都显得格外清新了。

没过几天，“宣传队”的一男一女到我家来，让我母亲帮他们照看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儿。从此，他们每天下班后就轮流到我家，一边和孩子玩一边给我们讲共产党、解放军是干什么的，“人民政权”是怎么回事儿，什么叫“同志”，什么叫“土地改革”……我几乎被这些名词、新事情迷住了。好几次都是端着碗忘了吃饭。后来，他们知道我喜欢唱歌，还一句句地教我唱了好些革命歌曲呢！

我家居住的地面，当时属良乡县一区(城关)第四街。到我家来访问苦的工作队长老傅同志和区妇联主任姜希文同志，串过几次门之后，就决定以我家和另外三家为“核心户”，进行扎根串连。先组织农会，然后着手建立街政府，组织民兵，搞土地改革……

等到正式举行那天，全街的老乡聚在一起，大家用“玉米豆选举法”进行选举(候选人坐在主席台上背向群众，选举人逐一到台往自己想选的人身后的饭碗里放一个玉米豆)，选举结果是：王四爷爷当选为农会主席，我母亲当选为妇联主任，还有另外几个人分别当选为街长、治安员、民兵队长等等。在宣布完主要干部名单之后，工作队长还当众指定我和另一名少年共同负责组织少年儿童团工作。

打那儿以后，我的精神头儿可足了，几乎天天长在农会和街政府的院子里。一会儿人参加学习土地法大纲，一会儿帮妈妈到各家各户去收集支前军鞋，一会儿给擦枪的民兵打下手，一会儿又带小伙伴们练习扭秧歌或粘糊“欢送解放军南下”的小纸彩旗……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说来也怪，那时候，只知道乐，不知道饿，一晃就是一天。

1949年10月1日，良乡的城里人刚吃过早饭，就按行业按系统集合好队伍打着红旗往阎家大院(会场所在地)进发。良乡的乡下人更是不辞辛苦，一反了“多年不办‘响动’”的做法，一大早就从村里出来了。待到帮晌午，良乡城里已经开了锅：黄辛庄的龙灯会，卢村的少林会，南梨园村的高跷会，公议庄的钗会，肖庄的跑旱船，还有不知属于哪村哪店哪街哪户的“张老背张婆”、音乐会、“吵子会”、小幡会……一班接一班地全来了。可比逢年过节热闹多了！

会场上，新搭的高台上挂起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红幅，台口的两边各挂了一个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见到的扩音喇叭。上空是飘着白云的高高的蓝天，最深远处的“背景”是那雄伟壮丽的燕山。那气氛既庄重严肃，又欢快活泼，人们一进来，就感到了盛典的声势之辉煌博大。

大会是用汽油发电机发电，用收音机经过扩音，再把天安门的实况广播，送到了每个良乡人的耳鼓里。让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共享这平步青云的幸福。

宣布开会以后，几万人的会场里竟然鸦雀无声，人们都在悉心地聆听生怕那庄严时刻从首都的心脏传来的每一点声音从耳朵旁“溜”过去，总希望自己比别人听得真切听得详明。于是，礼炮声也一样在他们的心中发生着震颤，《国歌》声也同样在他们的心底产生着共鸣。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人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会场上立即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便是锣鼓鞭炮齐鸣。国旗、彩旗舞动，帽子花束也抛向了天空……经过好一阵狂欢，会场才在组织者的一再引导和“限制”下又重新安静下来。可是，当扩音器里转播完朱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并宣布阅兵式开始的时候，良乡分会会场就再一次淹没在红旗、花束、锣鼓、欢呼的热浪之中。各村的“大会头”们也不知怎么那么齐心，转眼间都在就地打场子走起会来了。直到晚霞染满天际夕阳收敛余辉的时候，各村来的欢乐的人群才陆陆续续恋恋不舍地各自散去。

可是，没过一顿饭的工夫，夜幕降临星月未明的良乡城，变得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了。

原来，良乡县人民政府事先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把学校师生、群众团体和驻在当地的中央机关、部队的人们都组织了起采，又开始了灯笼火把大游行。他们还特地邀请了刚从天安门参加庆典归来的几十名军乐队队员做先导，为游行队伍引路助兴。

由于良乡城仅有一平方公里的面积，回旋余地小，游行队伍从每一条街巷，每一个胡同穿行，也还有几处出现了“首尾相遇”、“各路会师”的交叉现象出现，给游行活动凭添了几分意想不到的兴头：每次“会师”时，军乐队就奏了一曲又一曲，我们学生则是唱了一歌又一歌，群众的口号是一声更比一声响，记者拍照的镁粉也一回比一回添得多……“中国共产党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呼，与歌声、乐声汇合在一起，引发得每个人都流淌出激动的热泪。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